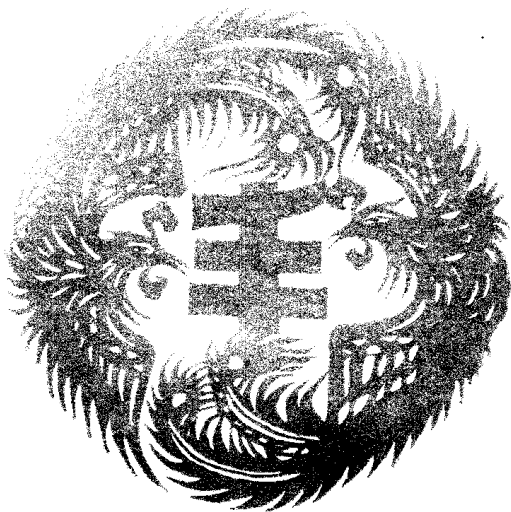




龍 吟

I25/50



新路

报告文学集

新要地区文联编

新要人民出版社

封面题字：袁 振

封面设计：陈乐生

新 路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375 插页：2 字数：160,000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4,000

统一书号：10102.997 定价：0.60元

出版说明

康濯是我国著名的作家和文艺评论家。收入此集的是他在粉碎“四人帮”后写的小说、散文和评论。

作品朴实无华，或抒情，或叙事，或立论，不事雕琢，力求自然，表现了作者所特有的风格。

江 淮 行

——皖东农村见闻

袁 振

谷满仓，
猪满圈，
树成行。
政策落实好，
不再大呼隆，
农村一派新气象。
童姑换花衣，
青壮盖新房。
社员生活甜又美，
我为人民歌且唱！

前 言

邵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滁县地区各级党委，不断清除“左”的影响，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全面推行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四年跨了四大步，粮油产量年年创造新纪录。一九八二年粮食总产量达到四十三亿七千万斤，比实行责任制前的一九七八年接近翻一番，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六点九；油料总产量达到三亿七千二百万斤，比一九七八年增长四倍，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十一。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农业商品率有了很大的提高。全地区粮食的征购、超购任务是五亿二千万斤，在实行责任制前从未完成过。一九七九年开始实行责任制，就完成六亿二千万斤，一九八〇年完成七亿零八百万斤，一九八一年完成十三亿八千四百万斤，一九八二年粮食年度，现在已入库十四亿多斤，预计还要入库一亿多斤。四年共向国家交售粮食四十二亿多斤，比实行责任制前十年的总和还要多一亿二千多万斤。粮食商品率由一九七九年的百分之二十二，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五。上调给国家的粮食越来越多，四年来共调出粮食二十六亿多斤（八二年粮食年度要求调出十三亿斤），比实行责任制前二十六年上调粮食的总和，还要多二亿七千万斤。社员人

均收入：一九八二年可达三百三十六元（包括家庭副业收入），比实行责任制前的一九七八年一百零七元增长二点一四倍。开创了全区农业的新局面。

然而，就在四年以前，这里还是一个“吃粮靠回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地区哩。尤其是“十年倒有九年荒”的风阳，以及定远、嘉山等穷困的县，那时候每年冬春，总要有大批农民拖儿带女外流逃荒要饭。“逃荒，逃荒，越逃越荒”，大片土地无人耕种，生产上不去，生活无着，就得再出去逃荒。如此年复一年，恶性循环，成了国家的沉重负担。

是这里的自然条件不好吗？不是。全区总面积一万三千三百多平方公里，可耕地六百多万亩，三百零七万多农业人口，人均二亩多地，有的地方人均合三四亩、六七亩。这里有山，有水，有丘陵，有平原，有圩区。年平均气温在十五度左右，年降雨量平均一千毫米，无霜期二百一十天。津浦、淮南两条铁路贯穿全境，交通便利，应当说这里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是比较好的。是这里的人民觉悟低、不勤劳吗？也不是。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就曾是新四军二师的根据地。当时在我党和抗日民主政权领导下，广大群众组织变工互助，开展大生产运动，送粮草，做军鞋，抬担架，支援子弟兵打鬼子。解放战争中，搞运输，支前渡江，这里的人民也作出了重大贡献。建国初期，这里的农业生产也有过连续上升的时期。粮食总产由一九四九年的八亿三千五百万斤，一九五五年增加到十九亿四千万斤。短短六年就增长了一点三倍。这是因为，那时刚实行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翻身的农民分得了土地，浑身都是劲；加上党和政府实行了发展生产、奖励劳动致富的政策；接着，又按照自愿互利原则，积极地、稳步地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由

临时季节性互助组，到常年互助组，再通过典型示范的方法，试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样，一步一个台阶，循序渐进，不知不觉地把个体农民引向社会主义道路。因此，生产力不仅未受到破坏，反而有了较快的发展。

问题出在后来。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推行，使得以高指标、高征购、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一九六〇年以后，虽然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作了一些调整，但“左”的一套政策并未彻底纠正。不久，陷入了十年动乱，乱批乱斗，折腾来折腾去，生产力受到极大摧残。再加上劳动上的“大呼隆”，分配上的“一拉平”，管理上的命令主义和瞎指挥，象条条绳索，捆住了农民的手脚，想干不让干，有力无处使，怎能不越来越穷呢？

一九七七年，中央解决安徽省委领导问题以后，在以万里同志为首的省委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在深入广泛地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即省委《六条》），着重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落实按劳分配政策。根据省委《六条》指示精神，滁县地区各级党委从抓年终分配入手，建立了“一组四定”（即划分作业组，实行定任务、定时间、定质量、定工分）的生产责任制，退还了社员的自留地，鼓励和支持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这对当时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一组四定”办法是一种不联产的责任制，社员的劳动与自己的物质利益不挂勾，不能有效地克服分配中的平均主义。而且农活复杂多样，定额难以合理确定，农活验收标准难以掌握。于是，来安县烟陈公社魏郢生产队和其他一些地方，在实践中摸索出了包产到组、以产计工、超产奖励、减产

赔偿的办法。接着，凤阳县城南公社岳林大队岳北生产队，又创造了大包干到组的形式。这些都及时得到万里同志和省委、地委的肯定和支持，迅速在全区推广开来。到一九七九年三月，这两种形式的责任制就发展到占全区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八，其中实行大包干到组的生产队占百分之三十六。这种联产到组的形式，比“一组四定”办法前进了一大步。但是，群众对这种责任制并不满足。因为它虽然克服了生产队的干活“大呼隆”，但仍存在着作业组的“小呼隆”，砸烂了生产队的“大锅饭”，又出现了作业组的“二锅饭”，个人责任不明确，劳动者的物质利益不能直接体现出来，劳动潜力不能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来。而且社员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经常出现矛盾，一时解决不了，就采取分组的办法。这样大组划小组，小组再发权，父子组、兄弟组仍然搞不到一起，干脆以户承包。象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一九七九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实行包干到户的。当年这个队就获得了大增产，粮食产量由三万多斤，猛增到十三万九千斤，对周围的社队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包干到户的经验不胫而走，由点到面，迅速推广开来。

包干到户是广大农民群众在实践中的伟大创造。广大农民在旧中国深受剥削压迫之苦，从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比中切身感到，唯有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过上幸福的日子。尽管他们过去曾被“左”的错误折腾来折腾去，弄到逃荒要饭的地步，也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他们要摆脱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恰恰是平均主义。为此，他们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的方向，一步一步地向前摸索，探求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一九七九和一九八〇年这两年，包产到组，大包干到组，口粮田，小宗作物包到户，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等各种形式的责任制，犹如百花争妍一般

出现在皖东大地上，它们相比较而存在，相竞争而发展。经过反复实践和对比，还是大包干到户这种形式的责任制最优越。正象群众所概括的那样：“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上交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它以责任具体、利益直接、方法简便为特点，因而易为农民所接受，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

实行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突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现行管理体制，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重大调整和改革。既然是一场大的变革，就不会没有阻力和斗争。由不联产到联产，由联产到组到联产到户，由包产统一分配到实行包干分配，几乎每走一步都有人反对、责难甚至压制。当然，绝大多数同志是属于认识问题。在此种情况下，作为各级党的领导，究竟是顺应民意、支持群众的正当要求呢？还是站在群众的对面，同群众“顶牛”呢？当时，许多负责同志和一批干部选择了前者，他们经常深入社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召开各种座谈会，与当地干部、群众一块讨论，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呼声，反复思考着上述问题。他们看望穷困的生产队，走进四面透风的低矮的茅草房，看到一家老小，数九寒天，缺衣无食，身披破棉絮蜷缩在稻草铺上，心情很沉重，有时禁不住流出眼泪，感到解放快三十年了，群众还过着这样的生活，作为共产党员，我们实在于心有愧！为什么我们的农业老是上不去呢？多少年来不就是因为，在“左”的错误影响下，在经济上忽视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在政治上不尊重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吗？群众要求干的事，我们不让干；群众反对的事，我们却强迫他们干。难怪群众向我们提出了这样尖锐的批评：“种田的人没有权，有权的人不种田，种田的人减了产，有权的人照拿钱。”已往的教训告诉我们，凡是同群众对着干、违背群

众意愿而自行其是的，最后必然失去民心，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其结果必然要犯错误，要碰大钉子。许多干部思考的这些问题，真正同广大群众想到了一起，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给了他们以强大的精神支柱。因此更加理直气壮地积极支持群众推行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的要求。尽管遇到了种种责难、压制，却始终没有动摇。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在滁县地区曾经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一九五七年，被“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压下去了；第二次是一九六一年，实行不到一年，又被斥为“方向性、路线性”问题，强行改了回去。这一次是第三次了。为什么它没有被扼杀掉，而有这样顽强的生命力呢？主要是因为：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有“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个规律在起着支配作用。我们现在的农业生产，就多数地方的情况来说，还是以老牛加木犁手工操作为主，科学技术水平、机械化程度和干部的经营管理水平都很低。农业的特点是，天天和有生命的物质打交道，作物生长周期长，又是露天作业，受大自然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每个劳动者劳动的多少、好坏，最终都体现在产量上。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必须根据土地、作物品种和节令等不同情况，进行独立决策，这就决定了适合分散劳动，不适宜集中劳动。长期以来，正是由于我们忽视了农业的这些特点，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水平”这一客观经济规律，片面夸大了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反作用，不停顿地改变生产关系，错误强调社队组织规模越大越好，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结果形成了劳动上的“大呼隆”，分配上的“大锅饭”，管理上的瞎指挥、强迫命令。再加上实

行按工分统一分配的制度，一些基层干部掌握了经济大权，逐渐地脱离了劳动，多吃多占，贪污挪用，无偿地占有社员的部分劳动果实。以上这些弊端，成为不治之症。可是一经实行包干到户，药到病除，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包干到户，对农民来说，突出的好处有三条：一是经济上实惠，二是政治上自立，三是劳动上自由。它既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又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包干到户象春风一样，吹到哪里，哪里面貌大变。凤阳县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四年来，粮食总产，由一九七七年的三亿六千万斤，上升到七亿多斤，翻了一番，从而开始摘掉了穷困的帽子。天长县，原来曾以为自己是全区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不适宜搞包干到户，直到一九八〇年才实行包干到户，农业步子迈得更大了。一九八二年粮食总产由五亿八千万斤，上升到九亿三千多万斤，人均生产一吨粮。事实雄辩地证明，包干到户不仅是治穷的“灵丹妙药”，也是打开致富大门的金钥匙。正因为这样，它才能以星火燎原之势，冲破重重禁区和封锁，迅猛向前发展。如今，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发展到农、林、牧、副、渔及社队工业等各个领域。“联产承包，一包就灵”。目前，在土地实行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养鸡鸭、养牛、养猪、养蜂、养鱼、种树、种花卉、开工厂、办商店等各种各样的专业户和重点户，以及不同形式的经济联合体，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皖东大地，繁花似锦，更加绚丽多姿。这部报告文学集的出版，正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和讴歌这里的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在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所创造的伟大业绩，和由此而带来的巨大变化。它必将激励人们在新的一年里，为进一步发展已经开创的农业新局面，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农业道路而作出新的贡献！

一九八三年一月

目 录

还乡散记	江晓天(1)
话凤阳	陈登科(14)
春回皖东	江 流(24)
重新飞起的凤凰	刘祖慈(58)
找到了金钥匙的人	公 刘(76)
粮食局长的两个夜晚	贾梦雷(92)
花鼓世家的命运	贾梦雷(99)
凤凰展翅	跃 渊(108)
中国, 有这样一个村庄	张万舒(136)
农民的贴心人	宋为民 余正新(147)
“刘一万”和“华八千”	张春生(157)
笑容	徐子芳(164)
小旅社里的畅想	曹玉模(180)
琅琊山下一枝春	廖远妹(188)
新风扑面	丁加胜(198)
粮食! 啊, 粮食!	洪霞、戈风、瑞年(208)

还乡散记

江晓天

一

离开我的故乡——安徽定远县朱家湾公社下靳村，整整三十六年了。

一九四九年冬，我曾回去过一次。那时，解放战争刚刚结束，公路尚未及修复，到炉桥下火车后，只好步行回家。正巧遇上雨雪天，凤阳山里洪水下泻，清洛涧东西两道河涨水，不得不脱掉棉裤蹚水过河。沿途经过的蚌埠火车站及炉桥、永康几处集镇，讨饭的很多。农村大多数人家，一日两餐稀饭，吃干饭的少见，吃三顿饭的几乎没有。干芝麻叶子，霜打后的芋头（即红薯）叶子，既作为下饭的菜，更充当填饱肚皮的食物。早晨，稀饭锅还没揭开，要饭的就上门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抗战时差不多，由于三年敌后游击战争，国民党军队疯狂“清剿”的摧残破坏，甚至比抗战时更贫困一些。我在家住了两夜就走了。

这次，趁参加淮河乡土文学笔会之便，顺路回老家看看。不是坐火车，而是乘汽车，从定远县城到炉桥，再乘通到公社所

在地朱家湾的汽车。通到村里的大路也有，因下雨，路面没有铺沙石，汽车开不进去。从朱家湾到我家，要步行八华里，为了少走三里路，就在八里张村下了车。陪我同行的两位老战友、一位年轻朋友，四人一起，由我带路，寻觅田间小道，步行回家。没有想到五华里不到的路程，我们却走了两个多小时。虽然，时隔三十多年，地形地貌稍有变化，可是，不光一个一个村名，我都能记得，连小路的走向，路边的水塘，童年时代跟奶奶走亲戚途经哪口水塘，老祖母怎样牵着我的手跳过缺口去的情景，都还清清楚楚留在我的记忆中。主要是因为路难走，下了几天雨，阴云刚刚散去，路还泥泞，粘脚，挪步费力，走得慢。特别是在一片冲洼地里，被一条小河阻挡住了，水道只有一米来宽，可两位老同志跳越不过，只得绕道。亏得两边是一大片长满茅草的荒地，二十多年不翻耕，土地板结，行走不陷脚，不费力。转游了近一个小时，才找到一小段水面窄的地方跨过去。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四日下午四点半进村，村里人见到我只是瞪大眼睛楞瞅着。难怪呵！四十岁以下的人不认识我，而四十岁以上人又所剩无几了。直到村中间，才见到我七十三岁的婶母，满头白发，满面红光，硬朗朗地站在门前，同两位老奶奶说家常。我激动地喊了声：“老婶！”她亦楞住了，我赶快补报自己的乳名，她明白了，两手拍拍破褂襟，叹了口气说：“乖乖，你可回来了。”一霎间，家人村邻们蜂拥而至，把我团团围住，“一时会聚如再生，牵衣诉昔以难当”。

二

人民总是向前看的。乡亲们，特别对实行生产责任制的三年多来，生产大发展，生活大改善，个个满意，人人高兴，他

们并没有逐一向我报告粮食、油料逐年增产的数字，定远人有个习惯，既不哭穷也不夸富。而是从两件事说起，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一件是争着请我吃饭。家乡人特别好客，还流行这么句话：“三个菜待鳖，四个菜待客”，至少要有四个菜，哪怕是青菜炖水豆腐，炒鸡蛋，也要凑足，还要有酒，才算是恭敬。自己再穷，借，也得这么办。大概是怕我深知这一习俗，一个个特别加以说明：“现在比前几年不同了，大米白面有的是，鸡鸭蹲在窝里，蛋放在筐里，方便得很。猪肉，小菜，酒，还能买到好酒，跑一趟朱家湾，就都来了。”他们说得很轻松愉快，我相信每一家都无须作难费力就能做到的。可是我一家也不能答应，因为时间匆促，只能住两天就走，去哪几家不去哪几家吃饭，就会得罪人。于是，就把大家请到我侄儿家吃流水席。第二件是住宿的问题。三间屋里挤满了人，说说笑笑，快到下一点了，还无散意。陪我来的三位客人，还有从别村赶来的十几位亲戚，肯定要留下过夜了。这么多人，到什么地方住，特别是哪里弄这许多被褥，不能不为之发愁。没想到，我一说，马上就引起一阵哄堂大笑，讥笑我还是依“老皇历”看问题。这个说“我家有床有被子，能住两个人”，那个说“我家能倒出两床被子”，不用几分钟，就把十几位客人分领完了。陪同我来的三位远客，由侄儿安排到另外三间新屋里的两张床上过夜。尽管还是土墙草屋，但住房却是增加了，被褥多了，而且干净了，不再有虱子了，应该说，这也是近三四年来，一向贫穷的淮南农村的史无前例的大变化。

安顿好客人们住处之后，几位叔伯兄弟又返回来拉着我聊天叙家常，直到下三点才把他们赶走。虽然极度疲劳困倦，可总是睡不着，一是村邻家人们现实生活的新变化，不由得要引起一番思索；另一原因是被窝里有一两只跳蚤，钻进裤裆里乱

折腾。对于虱子、跳蚤，我曾和它们打过二十年交道，习以为常，而且还练就了用手指头摸、捏、捉拿、消灭它们的本事。可是这次失灵了，大概是时隔三十多年，技艺生疏了。我越是捉不住，它跳得越欢。不得已，只好采用笨办法，起身到后园里把跳蚤放跑。回来，见前屋灯还亮着，走过去一看，弟媳，侄儿媳，侄女，还有天黑才赶来的妹妹，四个人正在忙得不亦乐乎。他们杀了四只鸭，两只鸡；锅里炖了两只鸡，明早下面条吃，四只鸭切成大块准备红烧，还泡了一盆干鱼。小侄儿用网捞回一小竹篮新鲜塘虾。大侄儿拎只大提篮，正要动身赶早集去买酒肉小菜。过去，过大年（淮南农村把腊月二十三叫小年）也未见有这么丰盛呵！厨房就在新盖的三间前屋里，前后无门，夜不闭户，串堂风很凉。三个侄孙和一个小孙女，共盖一条大棉被，睡在门边稻草铺上。我怕把孩子们冻坏了，生病。侄儿媳说：“皮实得呐，保管没事！别看大旺他们八九头十岁，能吃得咧，一顿一大碗干饭还不够。”我用手电筒照照看看，三个男孩红朴朴的脸上挂着笑意，睡得正甜。六岁的小孙女翻了个身，鼻子呼吸不太畅通，把她抱到堂屋床上睡了。农村的孩子由于生活环境的锻炼，比城市同龄孩子抵抗疾病的能力强。但入冬以后，能睡在串堂风下过夜而不感冒，确与生活好、体格壮实有很大关系。记不起是什么人说过：人们的面孔往往是观察社会的一个窗口。现在的淮南农村除了病人，“愁眉苦脸”、“面黄肌瘦”、“沉默寡言”，不见了。男女老少个个满面红光，人人脸上挂着笑容，到处听到高声说笑。

三

人欢，牛壮，家畜兴旺。我从上小学三年级开始，就学着